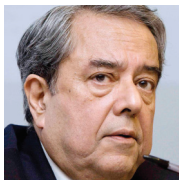
© Shutterstock



阿斯霍克·寇斯勒
发展方案组织创始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

两种致命的疾病

在联合国的早期历史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国际社会就认识到如果不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消除全球贫困，就无法确保全球和平和安全。之后，在联合国的资助下，产生了几个“国际发展十年”，然而与此同时，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的人口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联合国大会认识到全球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召开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然而，尽管会议提议联合国提出倡议、政府制定政策和公民社团采取行动，从而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仍在加速恶化。

没过多久发展和环境的概念就结合在一起。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出版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得到了布伦特兰委员会的认可，并通过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传播到全球各地。之后的几届峰会，尽管聚集了上百位国家元首、诸多随从官员、商界领袖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人类生活质量的退化和自然的破坏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今年夏天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里约+20峰会再次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大家相聚一堂，共同商讨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像往常一样，就目前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地球生命支撑系统受到的威胁这两个议题，各国领导人雄辩滔滔、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然而，当提及如何应对环境威胁时，尽管之前举行了为期数月的筹备会议，专家和外交官们还是无

法提供实质性的承诺。虽然世界各地人们高度关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并对此峰会给予厚望、建言献策，但是与实际所需相比，政府、企业、社会等做出的承诺实在微不足道。

在国家层面上，似乎只有最微小的承诺才能与国际系统接轨，由此做出的全球政策和行动很难达成普遍共识。而由于威胁的重大性和急迫性，我们目前的境遇十分严峻。

大规模的人类贫困和大面积的环境退化是很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并且相互影响，并行存在。富贵病和贫穷病最终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产生破坏性影响，二者往往互相强化对方，虽然看起来彼此消耗，却彼此共生。

受贪婪的驱使，人们对个人经济和物质资本积累的一味追求产生了富贵病。它无情地掠夺着自然资源，尤其是原料、能源和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它的蔓延同时也将维系人类和社会近千年的社会资本、体制资本和政治资本分割开来。

为了生存，穷人经常过度使用土壤、森林、河流等“可再生”资源，使得它们在人类需求的时限内不可再生。贫穷病与富贵病共存，加倍削弱了社会和政治要素，也无情地破坏了经济和生态结构。

不仅仅是道德要求，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最终需要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建立合理公平的经济体系，并对人类基本需求予以保证。这些基本需求包括：水资源、固定营养食品、安全用品、住房、房产保障、健康、个人成长、教育、知识、参与、权利和个人安全。此外，它还强调在改善生活方面，人人平等。

气候、生态多样性、土地产出能力、水资源、能源构成了我们的生命支撑系统。大规模的贫困现象、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的快速过度利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它不仅使人类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也给生命支撑系统带来严重危险。

许多新的影响因素不断出现。二十五年前，我们几乎没有谈论过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问题。而在今天，这些都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不知道在未来二十年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我们只为眼下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却没能为未来环境将带给我们的“惊喜”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做好准备。地球的环境承载已倍感来自各个领域的压力。数十亿人将来该如何寻找足够的食物、水源、住房、教育或工作机会，从而能够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眼下，我们必须马上解决人类贫困和环境退化问题，这二者彼此联系，又与过度消费和极度贫困息息相关。

要使全球经济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我们就必须对政策和发展的先后顺序做出彻底的改变。最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点：

将弱者置于首位。伟人甘地曾对这一原则做出过有力的阐述：它是指社会的首要责任是对生活在最底层、最贫穷的公民赋予优先权。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的必然之举。因为普遍贫困会使社会倒退、政治无序。

平等与公平。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因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极大不平等而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社会稳定是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随着当今世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日益边缘化现象、异化行为和暴力活动将会极大地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污染者付费。所有的生命系统都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不管是谁破坏生态系统都必须支付治理环境的费用。这些费用必须纳入到经济决策系统中，从而反映行为的真实成本。

预防和降低风险。不论我们处在何种境地，我们都需要做出抉择——包括技术和工作方法——我们必须选择那些能够给环境和社会带来最小风险的方式，力求做到小心谨慎。